



冯福林——“放羊娃”成长为革命战士

1942年初春的一天上午，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观看骑兵团汇报表演时，他看到有一个战士的武术特技相当娴熟，非常感兴趣。汇报表演结束后，彭雪枫专门把这个战士叫到身边询问他的身世、经历，这个战士向彭师长汇报了自己的学习经验时告诉彭雪枫：“我叫冯福林，是宁夏盐池人。”

你们不能锯我的腿

冯福林（1919—1975）宁夏盐池冯记沟人。少年时，冯福林的家境贫寒，十岁就开始给金姓地主家揽工放羊，每天早出晚归。放羊时，由于羊太多，他和一个30多岁的羊倌两人跑不过来，东家给了他一匹马，让他骑在马上去放羊。少年冯福林胆子比较大，他骑上马后不仅敢跃马飞驰，还常常在马上站立、蹬里藏身、倒骑马、偏骑马等，从小练就一身马上功夫。1935年，冯福林在陈记洼给人放羊时，一个马匪军官对一个羊倌的婆姨起坏心。就被冯福林揍了一顿，保长说冯福林通匪，把他关了起来。不久，他被刘志丹部的一个副营长解救，参加了陕北红军，后来成为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团的一名战士。

参军后，冯福林在师部当勤务员，后来又下到连队当战士，1936年11月参加了山城堡战役。抗日战争爆发后，冯福林所在的连队在陕西三原桥底镇编入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开赴到抗日前线。1937年9月中旬参加了平型关战役，任机枪班班长。在一次战斗中，冯福林抱着一挺机枪不停地向山下的日寇射击，等到战斗结束，他想站起来时，才发现自己腿受伤了，血肉和泥土凝在了一起。

在后方医院治疗中，医院要锯掉他的腿，冯福林一听急了，他从床上爬了下来说：“你们不能锯我的腿。”医生说：“不锯，你有生命危险。”冯福林说：“危险无非是个死，没有腿还不如死了。”最后，在冯福林的坚持下，医生剪掉了他腿上的腐肉，进行了包扎。值得庆幸的是不久他的伤口上长出了新肉，他的腿保住了，只是那条腿一直肿着，他常年不能穿袜子。

伤好后，由于冯福林不能长途徒步行军，就被分配在344旅某团骑兵排，不久因他骑术精湛，被提升为骑兵排长。

1939年底和1940年初，反共摩擦活动达到了高峰。为了扩大抗日根据地，1940年4月，黄克诚奉命离开太行山赴冀鲁豫，率领第344旅和纵队直属队越过平汉路，到冀鲁豫与新二、新三旅会合。不久，又到达豫皖苏边区新集，与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6支队会合。冯福林所在的连队跟随黄克诚和新四军会合后，留在了新四军十师。

精湛的骑术使冯福林成为骑兵团的“名人”，每一次汇报演出，他都被安排单独表演。陈毅军长、彭雪枫师长多次观看过他的表演。

1942年初春，彭雪枫观看骑兵团的汇报，忽然发现有个骑兵一会从马肚子上翻起来，一会一只脚踩在马镫上，一只手紧抓前面的铁环，拾捡提前放在地上的一把马刀。这个战士从马背上跳下跳上的动作特别多，动作最熟练，也最惊险。最后是站在马背上过来向，主席台敬礼，坐在一边的张震参谋

1944年秋，为了便于补充骑兵，骑兵团成立了学兵大队，冯福林为大队长，专门负责对新招的骑手进行训练。经过他的训练骑兵团不仅及时地补充了合格的战士，也更大程度地提高了全团战士的骑术，增强了战斗力。

抗日战争胜利后，将新四军四师十一旅整编为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张震任司令员兼政委，冯福林所在的骑兵团也整编到第九纵队。冯福林担任七十三团（后改为十三团）三营

克服伤痛苦练马术

1941年8月，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成立了新四军四师骑兵团，他在各部新四军挑选最精干的战士组成了这支部队。冯福林被选拔入内，他带着十师的13名骑兵来到了四师，担任骑兵团三营的排长。

在训练中，冯福林要求骑兵上马像炸蜢一样快，骑坐像磐石一样稳，奔驰像风雷一样疾。冯福林虽然会骑马，但他的骑术离周纯麟团长的要求却差得太远。从此，他每天都勤奋地训练，跌下马。爬上去再练。一次，他为了掌握从马肚旁翻身站立在

不穿袜子的西北骑手

长告诉彭雪枫这个战士叫冯福林，是全团最优秀的骑手。

操练结束，彭雪枫把冯福林叫到跟前，问是哪里人？如何学马术的？冯福林回答：“我是宁夏盐池人，从小在地主家放羊，有时要骑着马去放羊，所以自小就会。”

彭雪枫又问：“你是怎样参军的？”冯福林回答道：“马鸿逵到我们那里去打红军，有个白军军官对一个羊倌的婆姨起坏心。我揍了他一顿，保长说我通匪，把我关了起来。红军打过来后，放开了我，我就参加了刘志丹的队伍……。”

“放羊娃”走向“军区副司令员”

营长。之后，九纵又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第五师。冯福林带领他的营转战在山东临沂地区，先后参加了大山攻防战、孟良崮战役、南麻战役、攻打诸城、巧夺潍河大桥、昌南战役、凤凰顶战役、益林之战等。他在战火中也被锻炼得更加坚强，先后担任十三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先后率领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杭州、进军浙东沿海等。新中国成立后，仍率部参加舟山战役。

马背上的动作，不慎摔下马，头撞在石头上昏了过去。等他慢慢地清醒后，发现他的战马“小火车头”正用舌头舔他。

刻苦的训练，使他成为骑兵团一流的骑手，不久就被任命为骑兵五大队二区队的区队长。

冯福林练马术不是一个人偷着练，而是带着全区队、大队的战士一起练。从步兵调到骑兵的王玉坤是一个不服输的汉子，他为了驯马下了很大的苦功。他在冯福林的训练下，从一个门外汉练成一个掌握27套马术技术的尖兵。

正当冯福林叙述的经历时，彭雪枫突然问他为何不穿袜子。“报告师长，我在打平型关时腿上负了伤，他们要我锯腿，我死活不同意。后来腿没锯，到三四四旅当骑兵排长，可是腿老肿，穿不上袜子，只好穿这种不花钱的肉袜子……”说到这里，周围的人都乐了。彭雪枫也笑出声来。

彭雪枫根据自己的调查结论，尤其是与冯福林的对话，专门向骑兵团的同志们讲话。从此，彭雪枫记住了这个不穿袜子的西北骑手，多次在骑兵团和他谈话。

1951年，冯福林调南京军事学院学习，这个放羊娃终于踏进了学校的大门。毕业后担任二十一军六十一师副参谋长、副师长。1953年3月渡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1958年回国后不久，在1959年又奉命参加了甘南平叛战斗。从甘南回来后，他又先后担任雁北军分区副司令员、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6月15日从北京开会返回时因公牺牲。

（据抗日战争纪念馆、先锋盐池）

解放军接管宁夏民国日报社

1949年9月23日晚，身被战火风尘的解放军先遣部队进入银川。他们穿着一身被雨水淋湿的灰布单衣，汽车上架着机枪，在通衢大道穿梭巡逻，搜索残敌。店号商铺门半启半闭，或明或暗地营业。一些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僚都分头藏匿抢运家私细软，但绝大多数低级公务员都守在机关里，因为旧省府秘书长马廷秀前两天就下了一道命令，各机关保护好公文档案和公共财产，并逐一加贴封条，等候解放军接管。

次日傍晚，解放军就陆续进驻旧省府、马鸿逵大公馆、西塔、鼓楼等要点。民国日报社门口亦有解放军岗哨。8时许，一辆吉普车停在报社门口，进来3位解放军，询问旧报社情况后，让把所有走散的人员都找回来，并问社长是谁，人在哪里。听留守人员说是马敦静军部政治处少将处长徐静兼任，早三天就把家属从报社搬走，不知去向。一位带陕西口音的军代表说：“你们把收报机上的封条统统扯掉，马上开始工作（事后得知他是十九兵团副政委潘自力）。”于是，留守人员就撕去收报机上的十字封条，开始收录新华社自北京播出的口语广播新闻。因为军管会尚未成立，暂由十九兵团六十三军政治部监督工作，每晚抄收新闻到凌晨截稿，之后要立即送到六十三军政治部（驻马鸿逵大公馆）。第二天，一位姓韩的军代表叫一名留守人员同他乘吉普车到印刷厂去印《约法八章》。印刷厂在北门外旧满城，工人大都散伙，铅字也不完整的，很难凑成一篇文章。军代表让大家想办法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工人们就自己动手排印，印出了几百份《约法八章》。

9月26日，天气晴朗，解放军举行隆重的人城式，群众游行庆祝，街头汇成源源不断的人流，欢呼声此起彼伏。没过几天，三边日报社社长张源率领工作人员接管了报社和旧中央通讯社，积极准备出版新的《宁夏日报》。由于各方面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暂出版《宁夏新闻简报》，遇有重大新闻发行号外。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重庆、成都相继解放；四川主席王陵基被人民解放军活捉；新疆陶峙岳将军起义；广州解放；蒋介石向台湾逃窜等胜利消息不断传来，全国人心振奋。《宁夏新闻简报》特刊发表，几百份号外放置在报社门口，被群众一抢而光。

（据银川党史网）

民国固原两次特大自然灾害

民国年间的两次特大自然灾害，一是民国九年（1920年）的海原大地震，有27万人丧生，其中固原死亡13万多人。二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严重旱灾，灾民近20万人，其中死亡7万人。这两次灾害，使固原人元气大伤，多年缓不过劲来。

民国九年海原大地震

1920年12月16日20时6分9秒，即农历十一月初七日，海原发生了强烈地震，震中位置在北纬36.5度，东经105.5度，烈度12度，震级为8.5级。由于这次地震非常强烈，仅六七分钟，六盘山区各县即成一片废墟，人民死亡过半，房屋、财产和耕畜损失殆尽，方圆数百里内，“村庄覆没，人烟断绝，鸡犬灭迹”。波及范围十分广大，震源激起的地震波，使陕、甘两省同时震动，灾情严重者达54县，重灾面积达到1000平方公里，死亡人数在27万左右。

地震有有感面积更大，使北京“电灯摇动，令人头晕目眩”；上海“时钟停摆”，广州“掉灰泥片”；汕头“客轮荡动”。甚至香港的“大多数人感到震动……地震时，香港的最高法院正在审讯案件，受到了干扰”。越南海防市“中央观象台上的一个天文钟被震停止摆动”。大半个中国几乎都感觉到了震动，甚至千里之遥的汉口也震倒了半壁朽墙。1935年5月15日，《南京日报》称海原大地震的强烈度使“地震仪针亦出筒至不能测其剧烈之度”。由此可知，“全世界皆受此波动”。可见发生在六盘山区的这次大地震是有文字记载以来，古今中外少见的最强烈地震。

在这次特大地震中，六盘山区各县均遭灾难。海原县城位于极震区的中心部位，地震时忽见大风黑雾，天际闪现红光，地下有声如雷吼，“地如船摇，人不能立”。土石山均有崩塌及移动，尤以土山崩溃为多。山坡平地均生裂缝，长短不一。平地裂缝多有泉涌，其色或绿或黑。海原县城内除一座钟楼和一口矮小的土坯拱窑外，其余建筑物完全荡平，村镇全部毁灭者比比皆是，全县陷入人间地狱之中，遍野横尸，往往全家或全村遭难而无一幸存者。全县压毙人数达73027人，占全县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同时，压死牲畜7万余头。全县房屋十分之八均被震坍。大震第二天，又忽狂风大作，嗣后复降大雪，老弱妇孺忍饥挨冻，餐风露宿，相继僵毙旷野。灾民无衣、无食、无宿、无医，惨不忍睹。

民国十八年的严重旱灾

从史志记载来看，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大灾荒是由多种因素酿成并逐步达到高峰的。早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时，旱象初露。次年，“民饥”已被记入《甘肃历代天灾考略》，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时，甘肃“全省空前大旱，自陇东迄于河西，南起岷岷，北达宁夏，50余县早、雹相继”。民国（1929年）十八年，荒旱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峰。《甘灾纪略》重点指出：“固原、隆德等县除特大旱灾外，复冰雹、虫害、洪水、霜冻相继。”固原和泾源的县志也记录在案：“固邑河干见底，井水枯竭”，“夏、秋大旱，泉水涸，河源竭”。

《民国固原县志》保存了石作梁的《己巳饥馑记》，记载了当时的惨景：“始初，人以油渣为食，此就小康之家有之，其他即此亦鲜所有。荒年既无禾苗，焉有草根？所为树皮、油渣者，遇馮为上等之馐，真不啻丰岁之山珍海味也。米珠粮玉，持金难易，人想五谷，梦寐呻吟。兼地方驻有军队，不时搜索米面。更土匪蜂起，四野被掠，既天灾而又人祸，人民太苦。饥状有不忍为述之惨。时外来逃荒之户，以人易粟，及糗之灾，与粮即售，换顿作媵。少艾者愿质身作佣，但希果腹，他无所冀。甚之中年之妇，其流散乡间者，求食依人，甘为妻妾。童子认为父，只盼收养，不计身值。饥之甚于斯极矣。”在固原城内的磨针观（庙宇），“夜半穷人割食人肉，余初不信，一日往察，观内有一死尸，遍身肉被割净，不识为男女也。此余亲眼所睹实有之，非讹传耳。诸如此类，不胜所详，执一可例其余矣。”

据统计，民国十八年（1929年）甘肃省灾民达250余万人，饿死140余万人，60余万人死于病疫，30余万人死于兵匪杀害。民国十九年（1930年）“本年甘肃省旱灾灾情继续扩大，发展到60个县，灾民311万人，死亡人数200万。固原、隆德、海原三县的灾民，亦由去年的20万人，减至13万人，即死亡人数达7万人。该地区全户、全族，全村死绝者，比比皆是，惨不忍睹，可谓人间罕见之浩劫”。隆德县城原有居民200余户，到本年（1930年）夏季时只剩下四五户”（《甘灾纪略》）。

1929年，上海华洋义赈总会观察干事安献金到甘肃调查灾情，目睹并具体报告了隆德等县的灾情实况：“沿途灾情之惨出意料之外”“以人为食之事，在该省司空见惯”“天灾之重，可谓绝无仅有”。这样严重的灾情，国民党政府是什么态度呢？《隆德县志》直言不讳：“民国十六、十七、十八年旱灾、匪灾迭蒙……虽有赈务分会之设，然毫无经费，不过奉应文书，徒用空名，并无实际，又有灾情救济委员会，亦只宣传实况而已。”（据宁夏文史网）

抗战期间宁夏预防绥西鼠疫侵入始末

1942年2月，绥西陕坝、五原、临河等地发生鼠疫，百姓死亡日渐增多，传染、蔓延甚厉，已达宁夏磴口县附近。

一

自绥西发生鼠疫之消息传到宁夏后，宁夏省政当局奉卫生署令，“迅速实施预防检治，堵塞侵入省境”，当即成立了宁夏省防疫委员会，作迅速之动员、敏捷之措置。

1942年2月12日13时，宁夏省政当局在省卫生处成立宁夏省防疫委员会，并召开防疫会议。省民政厅厅长海涛、省军警督察处处长程福刚、军医处处长朱文魁、驻宁军政部第六防疫大队大队长成正田、省会警察局局长马如龙、省垣商会会长乔森荣等参加会议。

为预防鼠疫，避免鼠疫波及宁夏，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宁夏省防疫委员会组织章程》和《宁夏省防疫委员会检治站暂行规则》等项条例；议决聘请邵协文大夫为宁夏省防疫委员会秘书；决定划拨专款每月2500元，联合驻宁夏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部所属之军医，以及驻宁夏军政部第六防疫大队和蒙古卫生院等，于5日之内，在毗连绥西之入口冲要地点的宁夏磴口、石嘴山、陶乐、吴忠堡之沙葱沟等处，以及阿拉善旗定远营、内蒙鄂托克旗等地，设立检疫站，依法实施检验，并注重断绝交通，实行堵御方法，积极推行防疫工作，以资预防。

二

1942年2月中旬，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致电宁夏省政当局曰：“司令，已派第六防疫大队驻兰之第三中队宋队长押运大批鼠疫血清，于本月（2月）18日专车来宁，一俟该批血清到达后，想鼠疫猖獗当自不难扑灭。”接电后，省政当局立即发布消息曰：“鼠疫血清已由兰运宁，到达后即可为市民广泛注射，鼠疫凉

可不致再蔓延扩大。”

2月21日，驻宁军政部第六防疫大队接兰州来电，准将运输鼠疫防疫血清200支，除100支留宁夏急救外，其余100支将即转运绥西急用。

2月22日，鼠疫防疫针在第六防疫大队驻兰州第三中队宋队长押运下，由飞机运送到宁夏省垣，省卫生处及驻宁军政部第六防疫大队“分别开始普遍注射，将来鼠疫之猖獗自不难消灭”。

2月24日，省政当局发布劝民《布告》，大意略谓：“凡在本省境内人民，切实遵行防疫规则，如无特别要事，最好勿往绥西一带，如因特别要事必须前往者，返回时须经检查站进行检查，未经检查者，绝对不准其远行”等语。

3月中旬，“大批医治鼠疫之血清注射及防疫药品”由重庆航运转道运来宁夏。

三

1942年3月初，驻宁军政部第六防疫大队因绥境鼠疫流行，卫生人员需用颇殷，特派该队之卫生员前往绥西工作。

3月25日，驻兰州之卫生署西北防疫处处长兼西北卫生专员杨永年携带大批卫生防疫人员及治疗鼠疫之特效药品于前日午后由兰州抵达宁夏省垣。

3月27日，《宁夏民国日报》发表《防疫上的一些意见》，文章指出：“西北文化落后，卫生常识极度缺乏，杨处长是西北防疫的负责人，盼着杨处长到宁夏来的机会，贡献一些意见：

一、关于本省因传染而造成的死亡率，我们虽然不知道确实的数字，然而依如耳听目睹的结果，一定很大，希望以后：1.切实调查经常之传染病种类。2.统计因传染病而致之各项死亡率。3.主动及联合宣传预防办法。4.采取有效强迫预防。

二、关于公共卫生，本省医疗、卫生

两方面之不断努力，已有相当之收获，然而，阳春附逆，一般市民多无彻底力行之。今后：1.用严厉方法，取缔公共场所之不合卫生事项。2.有关市民健康之工作，应积极推行，以与防疫工作收辅助之效。

三、本省是著名的畜牧区域，畜牧业颇繁殖和疾疫死亡关系民生。今后：1.加强当地畜牧预防疫的机关。2.切实奉行畜牧疾病预防和消毒。3.深入蒙旗工作。4.取缔不合法之兽医。”

1942年4月1日，《宁夏民国日报》以绥西一带鼠疫现已平息，所有在省境各处设立之检疫……一律撤销。4月2日，卫生署西北防疫处处长兼西北卫生专员杨永年等一行50余人，在宁夏工作结束，离开宁夏省垣，前往“绥西一带防治鼠疫”。直到4月下旬，“绥西鼠疫消灭后，所有本省卫生当局及西北防疫处之大批医生防疫人员，均已次第归来”。

四

绥西一带发生鼠疫疫情后，宁夏为预防鼠疫波及，全民紧急动员，开展了大规模的防疫宣传与清洁卫生工作。

1942年2月18日，《宁夏民国日报》刊登《家庭常识》一书中的《鼠疫防治法》，从什么是鼠疫、预防方法、临时救治方法三方面进行了介绍。当天，《国防副刊》第12号发表《用中国医药诊治鼠疫病之商榷》，从鼠疫初时症状、诊治方法、治病药方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2月24日至25日，《宁夏民国日报》刊登《鼠疫》文章，从鼠疫的定义、病史、细菌、传染、症状、治法、预防等7个方面对鼠疫进行介绍。

2月25日至3月3日，宁夏省卫生材料厂在《宁夏民国日报》上刊登《要防疫，须戴鼠疫口罩》的广告。

磴口县为预防鼠疫进入宁夏的门户，1942年2月，磴口县防疫站谢主任、胡技正自到磴口以来，积极推行防疫工